

莊春波
著

古史鉤沉

歷史教學社



古史钩沉

庄春波 著

历史教学社

1994年10月

蘇平如

PDG

古史钩沉

庄春波 著

历史教学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251 号)

汇洋公司照排部排版三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 11.25 印张 350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

津新出图字(93)001852

定价:15.00 元

春波和我(代序)

70岁以前,对于为人写序这样的事,我是一直坚决的婉言推拒的。理由很简单,我算什么,我有何德何能,哪一点配给人写序?为此,还开罪过几方人士,甚至说我有架子。呜呼!我是一名卑微到不能再卑微的人物了,像蝉的幼虫一样,是活在很深很深的土里的,架子从何而来?但到70岁以后,我这堵堤坝不知不觉也被时代潮流冲了几个窟窿,掐指算来,也为人写过几篇序的了。

但在这中间,春波老棣,应该属于另当别论。我们中间有一点缘法。我常常这样想,人缘和地缘总是纠缠在一起的。具体说,是指泉城济南,在它的怀抱里,我前后两度缔结下平生可贵的翰墨之缘。第一度发生在43年前的1948年,那时王耀武刚刚打垮,我从华北调来当个小干部,工作之余,我就主动到经十路王献唐先生的“三家村”去拜访,去请教。王老长我21岁,老家日照(海曲),与我老家不过百里之遥,都属于“胶东”这个片片。转瞬之间,王老辞世已整整30年了。当他弥留之际,我正在河西祁连山下接受劳改,无法亲侍床第。王老学问之浩渺,像我这样再活三辈子也不堪望其项背,但我一点也不自卑,王老也并不因此而看不起我,因为他老人家聪明绝顶,他会看到除开我之所短之外,也有我之所长;时代的增新,也为我的所长增翼,例如哲学,严格的汉学家是不搞的,只搞考据。王老就像“宁都三魏”的魏禧那样,对青年王源(昆绳)这匹“挟纆之马”表现出又约制又宽纵的复杂心情。

话又说远了。现在说第二度缘法。8年前的1983年,我从兰州回到山东大学做半年的讲学,春波不声不响来听课。有一天在四大马路书店里碰上了,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我们就结识了。我长于他32岁。他老家潍邑,距我不过60里。他中等个,微胖,一支脚似乎稍稍不良于行,是一位军官的儿子,没有拿过什么高等文凭。他思路纵横绵密,如挟纆之马。当然他有他的所短,但也正如我以一个31岁的小夥出现在王献老面前的时候一样,我也不是十分不聪明的人,我也懂得他

在所短之外,有所所长,并且随着时代的增新,所短日有所补,所长日有增殖。羽翼渐丰,有朝一日就会如垂天之云。我们的缘法,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上缔结下来的。

春波一进入学坛,一上来就搞先秦史,先秦经、子,先秦思想,先秦文化。这没有很大的勇气,再加以卓识,是很难达到的。在这里,我有一段新义,准备借题发挥一下。我是说,一个人一辈子专精的方向,是很难确定下来的,以我为例:最初想专精英语,其中带有甚深的谋生气息,因为翻译稿子可以赚稿费,当外语教员可以拿薪水。后来感到光图“谋生”不行,还得远大点,才开始搞历史。可是一开始胆子小,只敢搞明、清。慢慢胆子一天比一天大,从时代上由明、清而南北朝、而秦汉;从范围上由人物、思想而社会经济;而阶级斗争;最后 60 岁以后,才落到先秦历史、先秦文化上来。到这里,“妾心古井水”,再不动的了。不少人拿我这一生的治学,作为奚落的话题,说我像后汉书马伏波传里的一句话:“类西域贾胡,至一处辄止。”又有人说,我像梁启超和章学诚。这个话,在我看来,不是贬低我,而是拔高我了。试想,我何人斯,而敢与实斋、任公相比拟?! 但我要严肃地说一句,像我这样这边爬爬、那边滚滚,一辈子算下账来,我感到我没有吃亏;而是赚了很大便宜的,我要比那些考证竹头木屑还沾沾自喜的先生们,要开阔得多。我爬来爬去,没有白爬;滚来滚去,没有白滚。我沾了满身的泥土、落花、落叶、木屑,到头来,我的综合能力得到了培养。

春波一上来就搞先秦,是会遭遇种种困难的,但这不要紧,许多根底方面的东西是会追补起来的,我们不可被陈寅恪先生“不敢读先秦两汉之书”这句话吓倒。而春波搞先秦还有很大的优越性,就是他思维的幅度广,思维力锐利,别人想不到的那些面,他会一个一个去想。这样是会开出很大很大的花来的,这一点我敢预言。但顺便提一句,等这花开出来的时候,我个人化灰约已 20 年,正如王献老化灰已经 30 年了一样。

· 赵儒生 ·

1991, 3, 27 日, 兰州

目 录

我和春波(代序)	赵儒生
舜征三苗考	(1)
夏纪年与羿浞代夏少康中兴轶史考	(13)
楚族溯源	(34)
楚史三说——楚族西迁年代考	(46)
“出日”与扶桑	(55)
“象刑”解	(64)
星象与天命——《河图》、《洛书》考	(72)
《周易》与原始思维	(83)
《管子·问》篇复原	(93)
田齐失政论——《法禁》、《法法》篇本事考论	(104)
《侈靡》篇作者与成书年代考	(117)
《侈靡》篇与田齐国策之争	(132)
《侈靡》篇思想渊源析论	(145)
环渊与道阴阳学派的形成	(158)
邹衍与阴阳五行学派的形成	(168)
春秋民本主义军事思想论要	(186)
齐魏马陵之战新考	(197)
秦国尉与汉初太尉考	(217)
“閭左”钩沉	(234)
秦汉武库制度	(247)
汉代的军用地图	(258)
西汉兵制考略	(261)
王莽新朝兵制考略	(288)

东汉兵制考略.....	(297)
试论古代雇佣劳动.....	(320)
从《太平经》看东汉社会危机和早期道教的产生.....	(330)
《太平经》与黄巾起义.....	(341)

舜征三苗考

在湖南省楚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年会(1985)上,有关舜征三苗、荆南舜迹与两湖地区先楚文化的关系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兴趣。针对会议的有关争论,笔者将自己的观点及与会发言整理成文。

一、如何看待关于舜的传说

对史前传说,有两种错误的态度:一是将传说视为信史;一是将传说斥为伪造。将传说视为信史的结果往往是求得了一个“伪史”,先时疑古派的功绩固然在于推翻了人们对千古伪史的盲目崇拜,但其所失也在于将真实古史的“影子”——先民留下的传说也一并扫除了,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

在疑古派看来,虞舜的传说皆不可信,当然舜征三苗等等的传说也是伪造的。不过,笔者倒以为这些传说与两湖地区史前人类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是上古氏族部落史的投影。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伸出其氏族来,但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神话及其神祇要古老些”(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69页)。这一思想为揭示上古传说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传说既非信史亦非谎言,而是上古氏族部落生息活动的投影,是先民的精神产品,是遗留至今的史前人类文化信息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理解对剖析虞舜及舜征三苗传说,荆南舜迹传说等等是有益的。

上古传说与氏族部落的活动是不可分的,中外概莫能殊。在我

国,直到春秋时代人们还保留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祖先崇拜观念,祖先神是氏族部落对遥远先世的追忆,同时也是神化了的创造物。因此,追循这些氏族部落的踪迹就不难上溯到关于这些氏族部落祖先神被创造出来的那个时代,也很可能会找到一些真实的上古史的遗存。譬如,帝舜是否实有其事或是否真如传说所描写的样子,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他最初本不是天帝,而仅仅是某个氏族部落或部族所尊崇的祖先。他之所以变成天帝,不过是他的后裔们代复一代的祖神崇拜的结果。《国语·鲁语》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颡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颡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喆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里涉及到有虞氏、夏后氏、商、周四个族属,其中商、周已进入历史时代,是可信的;有虞氏后裔为陈、夏后氏后裔为杞与商人后裔为宋一样,也都见于周代。所以崇信这一批祖神的族属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周代由文王始昌而武王得天下,商人由汤得天下,夏人由禹得天下,那么,有虞氏大约就是由舜得天下了,因此他们被“宗”。文王、武王、汤的存在已入历史时代,而禹、舜则尚属传说时代。显然,对夏后氏、对夏后氏、有虞氏的后裔来说,禹与舜有如武王及汤对周人和商人具有同等意义。在《鲁语》的模式中作为各族属上帝崇拜——禘祀——的对象如黄帝、颡顼、舜、喆不必一定是该部落血缘直系的祖先,但必定是某个上古部落联盟的首领,对他的“禘”祀,证明这个氏族的直系祖先曾参加过他的部落联盟。但是,作为“郊”、“祖”、“宗”的祭祀对象,各部族间血缘与世系的关系必然是泾渭分明的。

现代民族研究表明,在许多落后部族那里,人们仅凭口耳相传,凭记忆,就可以将本家族的世系上溯到几十代以前,一直上溯到本族崇奉的祖神为止。这种谱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而那些祖神则往往是古代的英雄,对本族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故其事迹被夸张、被神化而深存、流传于后代的记忆中。《史记》的《夏本纪》、《殷本纪》、《陈杞世家》等等许多篇目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谱系和传说吗?商人禘舜及其先公先王的谱系既已由甲骨卜辞所证明,则其他的

谱系，譬如有虞氏的谱系也未见得一定是伪造的了，《陈杞世家》所说的“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难道就没有历史的影子么？

传说在长期流传中难免不发生窜乱和变形，或者加上后人的加工，要恢复其原貌是很困难的。然而，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可以直接地认识了解史前部族创造的物质文化，进而探寻其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间的内在联系，认识上古传说这种精神文化与它们的创造者——上古部族本身。

二、舜征三苗是上古部落战争的传说

舜征三苗故事，原上古部落战争的传说，后来有了文字，才被记录下来，载入文献史册。分析剖判，这些传说内容多半古拙质朴，并没有多少神秘色彩。据《尚书·尧典》，有虞氏进入鼎盛期继而称霸中原之际，曾有“放逐四凶”的功业，征三苗是其中之一：“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天下咸服。”《尧典》是伪书，但其中也不乏上古文献的片段，伪中仍可见真。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部族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有虞氏由东方进入中原，自然免不了与当地及周边发生冲突，征三苗，放四凶就是这一时代的回音。

仔细揣摩这类传说中关于苗民的所谓“罪孽”，无处不体现着军事民主制时代的风貌。譬如，《尚书·吕刑》说“苗民弗用灵”（《说文》“以玉事神”为灵，乃言祭祀、敬神之事），“苗民”不尊崇有虞氏的神祇；又说，“苗民匪察于狱”，“惟作五刑之虐，曰法，杀戮无辜爱始淫为剿、刵、椓、黥”，有苗氏设立了监狱，创制了刑法，而有虞氏则还没有设置；另外，《奉陶谟》说“三苗不服”（《吕氏春秋·上德》、《韩非子·五蠹》作“有苗不服”），“苗顽，弗既工”，有苗氏对抗有虞氏，不服从其号令统治，不派工匠服役，不纳贡；《墨子·非攻下》说“三苗大乱”，兴兵反抗有虞氏等等。这些所谓罪状，时代特征鲜明，正是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后人增饰的成分不多，它既非

超人间的的神话，亦非狗尾续貂式的演义，基本上保留了上古传说的特点。这些传说反映了有苗氏与有虞氏部族间的对抗和冲突，也显示了这种矛盾的激化即会导致战争。于是，有了所谓“窜三苗”、“北分三苗”、“徂征三苗”、“迁乎有苗”以及“上帝不殛，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等等的話头（见《尚书·尧典》、《大禹谟》、《皋陶谟》、《吕刑》）。

征三苗传说见于先秦典籍者尚多，如《竹书纪年》载帝舜：“命夏后征有苗”。《墨子·非攻下》载：“昔者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禹征有苗……有神人面鸟身……搃矢有苗之将，苗师大乱，后乃逐灭。禹既克有苗……天下乃静。”《吕氏春秋·上德》载：“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这些材料尽管不无牴牾之处，但故事的梗概基本一致：斗争的双方一为有苗，一为舜禹系统的部族，终归是以有苗失败为结局。因此，可以看作是同一故事的不同传闻、演变，而这种情况是任何传说流传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是通例。

因此，视舜征三苗传说为史前期有虞氏部落联盟对有苗氏的战争征服活动的反映，恐不为过。

三、有苗氏地望与族属的推测

舜征有苗传说与荆南舜迹传说是互相关联的，那么，这些故事所涉及的地望是否可以考证出一些较为可信的线索来呢？不妨一试。

传说中三苗的地望大致是确定的，《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三苗国，在赤水东……一曰三毛国。”三苗也称三毛；赤水呢？《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赤、丹相通，赤水即丹水；南蛮即有苗，或有苗为南蛮之一，《汉学堂丛书》辑《六韬》：“（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丹水，源于陕西商县，至河南淅川会淅水，南入湖北均县，入汉水，《水经·丹水注》：“《吕氏春秋》曰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即此水也。”尧服南蛮于丹水，那么，继尧之

后的舜征苗民很可能更向南推进,从而进入江汉地区乃至湘中,《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所谓“南海”,即古云梦、洞庭之谓。又,《韩非子·上德》高诱注:“三苗在豫章彭蠡。”又见《战国策·魏策一》吴起言:“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又,《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岷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又,《说苑》卷一:“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大致方位总不外在洞庭、鄱阳二湖之间的湘、鄂、赣境上。吴起曾相楚悼王,熟知荆楚情形,后曾“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后汉书·南蛮传》),他所听到的传闻,恐更近乎实情。另外,《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当荆楚之地而至淮上;《通典》卷183:“潭州,古三苗国之地”,按唐代潭州辖今长沙、澧陵、浏阳、益阳、湘乡、湘潭等地,已入湘中;《太平寰宇记》岳州“今理巴陵县,南邻苍梧之野,古三苗国地”,也在洞庭以南;《路史·国名纪》引周景式语:“柴桑、彭泽之间,今衡、岳、潭之境”,大致总在荆南湘中。总之,文献所载三苗所在的地域,较前者略偏北,较晚者稍偏南,大要不出两湖地区。当然,这里没有涉及舜征服三苗后的“北分三苗”,即将有苗氏之民的一部分迁徙到北方的“三危”。

根据文献记载,传说中的有苗氏在中原受到尧舜禹部族压迫后迁入江汉再下湘中,似可作为一个假设,待进一步论证。

前文有了一个大致的地望,那么,是否可以该区域可考的族属之中推证有苗氏的族系呢?亦不妨一试。

我推测,三苗大概与商周以来居于中原西南的“百濮”地望相合。所谓“百濮”,乃是“合楚、蜀、黔、滇而以百名”(倪蜕《滇云历年传》)的、血缘混杂的庞大蛮族集团。三苗南迁进入两湖,其后裔在商周时代成了“百濮”集团的成员。商代,殷人进入两湖,与三苗发生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商末,周武王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组成伐商联盟。这八族既包括藏缅语系的氐羌集团,也包括南亚语系的百

濮集团，三苗后裔当在其中。我认为，八族中的“髡”应是三苗的后裔。《说文》段注谓：“《诗·小雅》：如蛮如髦。《传》曰：蛮，南蛮也；髦，夷髦也。《笺》云：髦，西夷别名。按：《诗》髦即《书》髡”。此释极当。《小雅》以蛮、髦并称，髦通髡，乃西南蛮夷中的一支。《说文》又言：“汉令有髦长”。段注：“髦长见汉令，盖如赵佗自称‘蛮夷大长’，亦谓其酋豪也。”可知殷周之际八族之髡后裔汉代犹存。髡即髦，从髟从毛。张舜徽先生《郑学丛著·演释名》详证了毛亦即苗。毛即苗。前引《山海经》称赤水之东的三苗国为三毛国，于此可证。髡、髦、毛、苗在这里作为族称是互通的。

四、商代的“苗方”

商周之际之髡，再向前追溯到商代，是否还有可以追寻的踪迹呢？回答是肯定的。

考古发现证明，殷商势力已进入两湖地区。譬如，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附近的楼子湾、李家咀商代贵族墓葬，江陵张家山商代遗址；又如，湖南多处发现殷商遗物、窖藏，在宁乡黄才附近发现商代遗址，另外，石门皂市、长沙鹿芝岭等多处均有发现。如果两湖地区确有三苗后裔，那么，商人与之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殷卜辞中确有关于有苗氏及征苗民的记录。

殷卜辞中，苗写作𠂔，是方国的名称。卜辞屡见“苗方”（《佚》二七六；《前》一、四、七；《续》上六三四等），兹举一例：“贞，今弗作其苗方祸”（《甲》三一—五）。此苗字于省吾先生隶定为𠂔，以为即《尚书·牧誓》八族中之“髡”（于省吾《双剑谿殷契骈枝续篇·释𠂔》）。𠂔、苗字形相近，根据前文的论证，应隶定为苗。有人认为三苗是以猫、狸、虎类猫科兽为图腾的氏族（刘敦愿《云梦泽与殷周之际的民族迁徙》，《江汉考古》1985.2）张舜徽先生《演释名》解“𠂔，𠂔也”。𠂔音读音如毛，与卜辞苗字下部形近，此可为卜辞读音近毛，三苗因亦读三毛之一证。笔者据卜辞苗字形、音、义推测，苗民似有戴羽毛为装饰之头盔

的习俗。《牧誓》以“羌、髡”连称，卜辞也有、羌、苗同版同辞之例：“……𡩿以羌、苗”（《乙》八六四九）。此版可证于省吾先生之说无误，进而可证苗民在商代不仅存在，而且与殷人曾发生关系。

上例卜辞中的“𡩿”，乃是武丁时代一位贵族军事统帅，在一期卜辞的“宾组”和“自组”卜辞中常见，另外，金文中亦多见，计有：𡩿鼎三（《三代》二、一、七一九；一三、五〇、六；一四、二四、九；六、二二、三）、𡩿自一（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二一一。）𡩿为父甲（阳甲）作𡩿一（《三代》二、一、七一九；一三、五〇、六；一四、二四、九；六、二二、三）、𡩿为父乙（小乙）作觚一、（《三代》二、一、七一九；一三、五〇、六；一四、二四、九；六、二二、三）、𡩿为妣辛（小乙之配称辛者）作彝一（《三代》二、一、七一九；一三、五〇、六；一四、二四、九；六、二二、三）等等，另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柄铭文𡩿的青铜大刀。可见，𡩿乃殷王族之胄，地位颇高。值得注意的是，𡩿曾为武丁派往征苗方的统帅。择例编次如下：1. …𡩿…三月…（前四五、四）；2. 己卯卜，王于来屯伐苗（人三六三）；3. 辛卯卜，王苗其…（铁一四六）；4. 癸未…令𡩿伐苗，今亡不若，允𡩿（拾四一四）；5. 壬辰卜，口苗方，大甲…大庚（续一、六三四）；6. …辰卜…苗…月（库一八九〇）；7. 丁酉卜，令𡩿征苗，𡩿（续五、五〇、一二）；8. 己亥卜，𡩿四月令𡩿步苗（林二、一四、六）；9. …亥卜，王令…苗方虘（佚二七六）；10. 五月辛丑卜，步𡩿伐苗（甲二二七七）；11. 癸卯（卜），令𡩿伐苗，今亡不若，允𡩿（拾四一五）。

大概在武丁在位的某年中，自三月至五月殷王室一直策划、实施着征伐苗方的军事行动，主帅就是𡩿。

苗方在战争中遭到了失败，故卜辞又有以苗方之民祭祖之例：1. “癸巳，王卜贞，旬亡祸，在十月甲午，苗祭上甲（明七八九）”；2. “癸未卜，贞，王旬卜祸，在十月又甲申，苗彭祭上甲（后上二〇、一三）”。可见，商代不仅有苗方，而且与殷人发生过战争，而且遭到失败，至有被俘的苗民作了牺牲，成为祭品。

殷人禘舜。舜征三苗故事是否是殷人征苗方的演义呢？这里不能完全排除将祭舜之族衍讹为舜本人的可能性，因而存在产生传说

的契机。

五、关于虞舜的考古学证据

荆南多“舜迹”，流传着许多关于舜的传说。《楚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屈原曾咏叹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兮木叶下。”看来诗人是熟知帝舜与湘妃故事的。秦始皇南巡至湘山祠，问湘君何神，博士官谓尧女舜妻葬于此处。秦博士也是熟知这些故事的。当然，如果认真相信诸如帝舜确实在征服三苗之后曾南巡湘中，在洞庭、湘水之滨有一爱妃，封其弟象于有鼻、舜死葬于苍梧等等故事为信史，未免太轻率了。但是我们不妨推测，或许正是虞夏之际或更早一点，迁入两湖地区而崇奉虞舜的氏族创造了这些故事。

商代以前没有文字记载，可以用来消除上述推测之不确定性的只有考古学的资料和方法。那么，问题就在于在这一地区商代以前的考古文化遗存中是否存在与有虞氏有关的文化信息，有无这类文化对当地土著文化产生影响——“更易其俗”——的可能性。我以为，这种可能性和契机是确实存在的。

我们先按通常的观点，把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典型类型——屈家岭文化——作为母文化，也就是南蛮文化的原型，看看它发生过哪几次比较显著的变化，而其中哪种变化与舜征三苗“更易其俗”的传说可能有关。

（一）屈家岭文化与夏文化的更迭

舜征三苗故事中，与禹有关的不少。禹是夏人的宗神。那么，夏文化在屈家岭文化的区域内出现，总是应当注意的考古文化变异的现象。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范例：在一般情况下，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层之上，应当迭压着湖北龙山文化层。但是，在中原与南蛮之域交绥地带的豫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屈家岭文化之上直接迭压着被称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文物》

1970、10。)。尤应注意的是，浙川的位置恰好正在中原部族与南蛮发生冲突的“丹水之浦”。夏文化与南蛮文化在这个特定地域内更迭，是否值得更进一步探究呢？而且，夏文化的南下并未止步于荆豫界上，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下层、王家咀遗址下层也发现属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文化层（陈贤一《江汉地区的商文化》《中国考古学第二次年会论文集》）。这说明，夏人已经深入江汉腹地了。夏人的祖先曾经是有虞氏部落联盟的成员，舜的故事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流传在他们口头上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二）再向前推溯，屈家岭文化与湖北龙山文化的更迭

晚于屈家岭文化的所谓湖北龙山文化，或称“石河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本地的屈家岭文化；一是中原的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为母体，糅合进中原龙山文化的各种因素，这种文化相的变异必须有一种足以引起移风易俗的巨大的力量使然。在上古，足以引起一个广阔区域发生文化信息强烈扰动并导致其发生相变的强大力量，莫过于部族间的战争或迁徙活动。湖北龙山文化的年代大致在 2430B.C—2030B.C 范围内，早于夏代纪年，与传说中早于夏代的“唐虞之世”约略相当。那么，上述文化相的变异，从时空范围看，是否能为“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的传说增加若干确定性的成份呢？

（三）尤应注意，在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变异的过程中，出现了东方大汶口文化的痕迹

在湖北省房县七里河发现了相当于龙山期的石河文化典型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在其早期遗址中就出现了屈家岭文化所没有的 V 式鬻和成年男女拔牙的风俗，这两个因素都来源于以泰山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V 式鬻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及向龙山期过渡时期陶鬻形制的变种（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鬻初论》《考古学报》1981.4）；而拔牙风俗最初也起源于大汶口文化居民（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1）。这种类型的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出现是否可以说明，大汶口文化居民经过中原（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3。）继而迁入江汉地区了呢？

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大汶口文化，是东夷人创造的文化，史学界也有人称之为“太昊文化”。有虞氏起源于大汶口文化圈。孟子曰：“舜生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孟子是“言必称尧舜”的，却将自己心目中神而圣之的帝舜视为东夷人，这恰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太昊或作帝誉、或作帝俊、帝叡，也就是舜，本是东夷的一支。《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帝誉（即太昊）……自言其名曰叡，断齿。”断齿就是拔牙。虞舜之族有虞氏原应属于盛行的拔牙之风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后来西迁进入中原。房县七里河遗址行拔牙之风、使用陶鬻的居民理应属于西迁的大汶口居民。饶有趣味的是：舜生于“诸冯”，即春秋时鲁城“诸”及“防”（《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其邑位于今山东省诸城、莒南县境，而这一带正有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典型遗址，并且数见“昊”字的陶文（《诸城前寨遗址调查》《文物》1974.1；详《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及《大汶口文化论文集》）。这说明孟子之说确有根据。无独有偶，湖北房县古称“防渚”：《左传·文公十一年》谓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即此地。难道山东的诸防与房县的防渚仅仅是偶然的地名巧合吗？

大汶口文化的标准器陶鬻在两湖龙山期文化中广泛出现，是又一值得注意的现象。两湖地区的土著，即屈家岭文化居民，也就是南蛮诸族，原来并不曾制造使用陶鬻，但陶鬻在该地区却成了“龙山时代的指示物，几乎所有的龙山时代遗存都有鬻”（王红星、胡雅丽《江汉地区“龙山时代”遗存的命名问题》《江汉考古》1985.3）。除此之外，还有与陶鬻伴生的镂孔圈足器如杯、豆等，也习见于大汶口文化。这类文化向南已经越过长江，进入荆南。在湘西北以车轱山遗址为代表（《车轱山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二集）；再向南越过洞庭湖到达湘中，以岱子坪遗址为代表（《湘乡岱子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同上）；向东，则达到平江，以猷冲遗址为代表。另外，两湖地区龙山期的二次葬风俗也有异于屈家岭文化而同于大汶口文化，值得注意。